

灯下漫笔

追忆与金庸先生的一次晤面

姚俊虎



金庸先生生于1924年,本名查良镛,浙江省海宁市人,祖籍江西婺源,汉族。1948年移居香港。这位享誉中外的武侠作家、新闻业者、政治评论与社会活动家,被人们褒以“‘香港四大才子’‘中国武侠小说四大宗师’之首”的美誉。

金庸先生虽然没有到过山西,却对三晋大地怀有深厚的情感,他在作品中,将雁门关、恒山、悬空寺、五台山、娘子关等悉数列入,令人目不暇接,直呼妙哉。金庸先生对于河东大地,更显示出特有的创意,用神来之笔形容也不过分。如《神雕侠侣》中所设定的黑龙潭:杨过前往捕捉九尾灵狐,遇见早就隐居在此的英姑,惊异地发现“黑龙潭方圆七八里寸草不生,本是一座大湖,后因水涸干涸,成为一片污泥堆积的大沼泽,而且人在水中,浮而不沉……”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运城之盐湖。《神雕侠侣》中“风陵渡口初相遇,一见杨过误终身”两句,早已成为名句。风陵渡既是郭襄邂逅杨过之地,也是二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之见证。作者远在千里之外,早已把与河东的缘分,对黄河的情感有声有色地写进书中:“时值二月初春,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口拥攘一片,驴鸣马嘶,夹着人声车声……河水重又凝冰,水面既不能渡船,冰上又不能行车。许多要渡河南下的客人都阻在风陵渡口,无法启程。”金庸在作品中借助这一真实地名,赋予其更为浪漫的武侠色彩,使虚构情节扎根于真实历史地理之中。

我有幸结识金庸先生是2007年冬。为编辑文化艺术界名人传记,搜集反映两岸及港澳中华儿女“期盼团圆”的电视副素材,我通过有关部门办理了赴台港澳参观考察的证件。经祖父早年移居台湾的挚友引荐,于宝岛见到了著名作家李敖先生。在短暂的会面空间里,李先生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,更露出“两岸一家亲”的热切情怀,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听说他与金庸先生是“不打不成交”的好友,我恳请他写封引荐信,孰料他笑言:“我的字体比较潦草,你干脆来个‘独闯辕门’,说不定还会遇到好运。”

不久后,我带着另一朋友写给金庸先生的便笺,匆匆赶到香港,很快便被门人引领到一间较宽的办公室。金庸先生听完我的表述后略带幽默说:“你的朋友可不少啊,李敖先生前几天来过电话,应该说我们从那时起就‘认识’了!”我在惊喜之余,更加明白了李敖先生的诚挚守信与良苦用心。

金庸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长辈,传闻偶有小意,却看不出疲惫之态。他的热情与豪爽,很快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。因为各方面差异过大,我不知从何谈起。先生一边摆手:“别着急,先喝杯水,再喘口气。听

规,‘画地为牢’。作者无须将自己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,要利用文明古国众多的人文地貌,更好地拨动读者之爱情弦。懂得‘替古人担忧,与鬼神为伴’,就会找到打开创造思路的捷径。人们常说‘天文地理、无所不通’应该成为一位作家最基本的素质。只要勤学、多看、常记,不仅可以提高自身思想境界,还可在文山书海中吸取营养,产生创作自信。”听了这些至理名言,恰如求学拜师一回,使人有了茅塞顿开之感。

大约一小时后,我起身向金庸先生道别,并奉上几盒晋南地方戏剧的录像带,诚邀他有机会光临关公故里,观赏盐池风貌。他笑着连连点头,转身取出一本《书剑恩仇录》,亲笔签下自己名字后相赠。他还给我提供了澳门文化界朋友的地址与联系方式。握住这位艺术大师温暖的双手,一时令人感慨!

刘羽熙

百姓记事

乡戏乡音

蒲剧,也叫蒲州梆子、乱弹,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的戏曲种类,它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晋南蒲州(今山西省永济市),流行于黄河周边省份(陕西、河南等)。蒲剧与秦腔同宗同源,合称“山陕梆子”,二者唱腔相通,并行发展,其演员经常同台,是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艺术品种。蒲剧依靠在戏曲历史中的地位,于2006年顺利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蒲剧从元杂剧中脱胎而来,融合了北方民歌的高亢唱腔,具有粗犷豪放的特点,还有许多上了难度的特技绝活,如翎子功、纸幡功、彩功等,其代表剧目都是以演绎历史人物故事为主,如《窦娥冤》《西厢记》《赵氏孤儿》。

儿时的一开始对戏曲并没有太大兴趣,后来反而对它爱不释手。奶奶那辈人非常喜欢听戏,我们村没有戏台,要看戏就得走上几里路去隔壁村。农闲时如果听说有戏班子来演出,奶奶就会提前把屋子收拾好,让我拿上小板凳,一起走去戏台观赏蒲剧。

戏台建于元代,历经几百年风雨还屹立不倒,台子比我高,台下是戏班子和村委会提前布置好的凳子,但来观戏的村民太多,凳子根本不够用,所以奶奶才叫我拿上板凳。戏还没开始,台下早已坐满了观众,奶奶在乌泱泱一片人中选中了个空地,把凳子放下来。“今儿个戏演的是啥?”奶奶向旁边的人打听。

“《苏三起解》。”收到旁人的回答后,奶奶满意地笑了。我如一溜烟跑去后

台,好奇地看着戏班子里的道具、乐器和服装,看他们一个个化成了大花脸。

忽然有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开始了,那些演员和伴奏的乐手们起身离开,我也赶紧回到奶奶身边。“你去哪搭了?”奶奶轻拍了我一下,嗔怪道。我露了个鬼脸,不说话。

随着台上逐渐响起了二胡三弦的背景乐,女旦戴着枷锁,脸上酝酿着悲愁的情绪,唱起戏,在向观众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。那时我还小,听不清楚方言里的唱词,也不了解苏三的悲剧故事,但可以从音乐、伴奏与演员的表演中直观感受到戏曲里的情绪。我抬头再看奶奶,她正入神地欣赏着表演,仿佛已经在唧唧呀呀的唱词中入了戏。

戏结束后回了家,奶奶也会亮一亮嗓子,传到我的耳朵里,便是家庭里的戏曲熏陶。乡下演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一次,耳濡目染后,我逐渐熟悉了本土蒲剧的唱腔唱词。几年之后,长大后的我正式从书籍、影视资料中了解到蒲剧的起源与发展,了解到蒲剧在中国戏曲艺术宝库中的重要地位,便也开始喜欢上它。

晋南人都是从小听着蒲剧长大的,谁不爱自己的乡音?如今,蒲剧早已从村里的小戏台走向了更大的全国艺术舞台,蒲剧剧目中所演绎的历史人物故事,也成了老百姓逢年过节、婚嫁嫁娶时必定观赏的文化景观。走出去的晋南人即使远在他乡,只要听到蒲剧里熟悉的乡音,也会被唱腔的乡愁所感动,因为它是河东人民连接乡土的感情纽带,也是运城人毫无二致的文化认同。

人生况味

超越时空的默契与温情

秦建华

在运城学院,我与张敏生教授的相遇,总是伴随着一种超越了时空的默契与温情。

他是中文系的元老,运城高专(运城学院前身)中文系的首任系主任;我是外语系的教师,外语系第二代的系主任。虽然学科不同,他长我一辈,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丝毫的生分与隔阂。每每在校园的小道上碰面,这位年届九秩的老人,总会停下脚步,笑意盈盈地与我站定。我们有说不完的话,从校园的变迁到治学的甘苦,从世界风云到趣闻轶事,那份投缘,仿佛是上天注定。更令我感动的是,五年前他听说外语系为我执教四十周年举办纪念活动时,竟然写了一首贺诗相赠!

在我眼里,张老师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。用一个词来形容他,乃“罗曼蒂克”无疑。这种浪漫,不是年轻人的风花雪月,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依然保持的对生活热爱的极致追求。

前两年,校园里总能看到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张老师胸前挂着一个精致的小牌,步履虽缓却精神矍铄。若是有人熟打趣地问他:“张主任,您这又要干啥去呀?”

他便故意挺直腰板,带着几分得意和神秘,抑扬顿挫地回答:“去咖啡馆!去咖啡馆读书去!”

那神情,那语气,活脱脱一个追求情调的“老克勒”。作为外语系出身的我,对这种“咖啡屋情结”有着天然的共鸣。在我们这个北方的校园里,这份“去咖啡馆读书”的宣言,显得如此特立独行,又如此可爱。这

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浪漫——中文系的儒雅底蕴,配上了外语系式的生活情调。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:无论岁月如何侵蚀,心灵永远要有一方可以安放灵魂的“咖啡屋”。

然而,这位“浪漫”的老教授,在面对生命的终极命题时,却展现出令人震撼的决绝与深情。

事情的缘起,是因为我前些天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。看着学校里日新月异的变化,我深感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弥足珍贵,便想着做一件有意义的事——收集整理一些退休老教授的手稿,包括他们的备课笔记、学术论文手稿等,打算搞个小型展览,或编印成一个册子,以此留住他们在学校发展史上的身影。

有了这个想法后,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张老师。于是,我专程去了他家。

走进书房,满架的书籍散发着陈旧纸张特有的香气。当我说明来意,希望能看看他当年的教学资料时,张老师没有丝毫犹豫,转身就从书柜深处搬出了几个厚重的纸箱,一层层打开摆在我面前。

那是一摞摞保存得完好无损的笔记和备课本。

随手翻开一本,时光仿佛在那一刻发生了折叠。他拿出他几十年前大学时代的笔记,但见字迹工整清秀,如同印刷体一般排列在格子里。红笔做的批注,蓝笔写的心得,条理清晰,一丝不苟。旁边放着的,是他教授时代的备课记录,从教学目的到板书设计,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深思熟虑。

看着这些泛黄却平整的纸页,我

被深深地震撼了。在这个PPT一键生成、资料随手可得的时代,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快捷与便利,却往往忽略了那份“慢工出细活”的匠心。

“张老师,您这保存得也太好了!”我由衷地赞叹,随即又忍不住好奇地问,“如此精心保存,留作何用?”

张老师笑了笑,轻轻抚摸着那些纸张,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,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:“我要把它们作为陪葬品。”

“陪葬品?”这三个字,像一声惊雷,在我耳边炸响。我愣在原地,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接话。在大学的校园里,在这样一位看淡洋气、浪漫的老人嘴里,听到这个词,有着一一种难以言喻的冲击力。

“对,陪葬品。”他重复道,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恐惧,只有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无限眷恋,“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,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要让它们陪着我。”

那一刻,我突然读懂了这三个字的分量。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,而是一种最高级的浪漫。他视这些文字为骨血,视一方讲台为圣坛。他不愿在身后留下金银细软,只愿在那个永恒的寂静世界里,依然有这些记录了他青春与智慧的纸张相伴。

生时,他是挂着小牌去咖啡屋的雅士;死后,他要做一个在黑暗中依然坐拥书城的守夜人。

看着这些珍贵的“待葬之物”,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。我想留住它们,我想让这些承载了运城高专中文系初创历史、承载了一位师者赤诚之心的手稿,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发光。



心香一瓣

紫桐花开

赵学湖

傍晚,微风轻拂,天空微微泛着橙黄。我和妻子漫步在小区南门外的一条水泥小路上,忽然,一股淡雅的甜香味儿扑鼻而来。我们翕动鼻翼,仔细分辨,哦,原来是紫桐花的清香!

循着花香抬头望去,路边的一株桐树上开满淡紫色的桐花,不少萼片已染上紫红。那花朵们有的淡紫含羞,有的浓烈如霞,整棵树仿佛被紫云缭绕,让人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。微风拂过,花瓣轻轻摇曳,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

紫桐花,是春天的使者。花骨朵外表好看,更是季节的标志性花卉。紫桐花盛开,是春天美景大戏的高潮,预示着春天这场美丽喜剧即将落幕。花儿提醒着人们,在欣赏春天美景的同时,不要忘记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更迭。

紫桐花,更是春天的机灵鬼。暮春来临,这些淡紫色的小精灵便纷纷绽放开来。那长长的花体,宛如一个个淡紫色的小喇叭,在枝头争奇斗艳,仿佛是春日里最耀眼的明星。那一抹绚丽的色彩,艳丽夺目,而且花期绵长,有时甚至能持续一个多月,为暮春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力。一阵微风拂过,花儿如串串紫色小铃铛,发出悦耳空灵的叮当声,传递着对春的无尽相思与无限柔情。

紫桐花,是思念与爱情的象征。暮春之时,桐花风这些五色艳丽的暮鸟会不失时机地采集你身上的朝露,它们亦成为爱情的化身。难怪被誉为“王桐花”的诗人王士禛曾赞叹:“郎似桐花,妾似桐花风。”白居易唱道:“桐花半落时,复道正相思。”李商隐惜别道: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这些诗句,无不将紫桐花与爱情、思念紧密相连。也难怪有人说,孟春、仲春、季春分别对应着《红楼梦》里的三春女子迎春、探春与惜春,她们的淡淡哀愁,或许都源自这紫桐花的深情与眷恋。

紫桐花,那一缕缕淡淡的紫烟,在王士禛、白居易的唱和中和飘逸,又在李商隐的惜别里散开,飘着旖旎的春色,一直传唱到今日。它不仅装点着春天的美景,更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感与寄托,成为春天永恒的象征。

悟语心言

生命的价值

王天源

我与王欢仁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。那时,他在南赵信用合作社担任主任,而我则调任南赵联社任联合校长。本属不同系统的我们,因公社常开会议而结缘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,便是严谨。会议上,他发言条理清晰,数据精准无误,对农村金融工作的见解深刻而务实,每一句话都仿佛经过深思熟虑,彰显着专业与专注。散会后,我们偶然聊起农村教育问题,惊讶地发现彼此在诸多事情看法上竟不谋而合。

在信用社工作的那些年,王欢仁几乎成为了“认真”二字的生动诠释。经他之手的账目,清晰明了;办理的业务,有条不紊。在那个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,他审核账目时,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拨动着算盘,清脆的算珠碰撞声,如同他对每一分钱、每一个数字的虔诚敬畏之音。据说,在他担任信用社主任期间,信用社从未出过任何差错,在那个人工操作占据主导的时代,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。

每年的评比,他总能捧回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奖状,还多次荣获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称号。然而,他从不将这些荣誉挂在嘴边炫耀。有一次闲聊时,他朴实地说:“金融工作关乎百姓的切身利益,认真是本职工作,哪里值得炫耀呢?”这份朴素的责任感,让他在那

个物质尚不丰裕的年代,成为许多农民家庭希望的守护者。我清楚记得,有一个冬日的星期天,我恰好去信用社,一位老农为了给儿子筹备结婚费用,特意前来支取积攒多年的存款。王欢仁不仅仔细地核对每一笔账目,还再三叮嘱老农仔细清点。待确认无误后,他又贴心地将不同面额的钞票分类捆扎好,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。那位老农感动不已,连连说道:“王主任,钱存到你信用社,我打心底里放心!”

然而,王欢仁的卓越之处,远不止于工作上的斐然成就。在那个大学生如凤毛麟角般稀缺的年代,他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都相继考上大学,这一消息在全公社乃至相邻公社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人们纷纷向他请教家教的良方,他总是谦逊地微笑着说:“哪有什么秘方,不过是让孩子明白读书的重要性罢了。”

其实我深知,他的教育观远非这样简单。有一次我去他家,正巧碰见他在辅导小儿子的数学。他既不严厉呵斥,也不越俎代庖,而是耐心地引导孩子思考,即便孩子犯错,他也不急躁,而是鼓励孩子重新尝试,直到孩子自己领悟出解题方法。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:“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。”他还说:“授人以鱼,不如授人以渔,读书如此,做人更是如

此!”他给予子女们的,不仅是对知识重要性的认知,更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永不言弃的坚毅精神。

如今,他的子女们皆已成才,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,成绩斐然,有的还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。每次我前住信用社寻人,我们一起去喝茶聊天,氛围轻松愉悦,情绪乐观豁达。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,从工作体会到人生感悟,我们无所不谈。

他有一种独特的亲和力,说话不急不慢,却总能句句说到人心坎上。爱用社的年轻职工对他既敬重又信赖,都把他当作长辈和导师。他从不摆主任的架子,职工们谁家有困难,他总是第一个知晓,并竭尽全力提供帮助。他不仅主动调整工作安排,让职工能安心照顾家人,还亲自带上慰

问品前往医院探望。他这种不动声色的温暖关怀,让那位职工和患病的父亲深受感动。

在我俩交往的十多年里,我从未见过他与任何人红脸吵架。即便面对再棘手的问题,他也总能心平气和地妥善化解。他曾对我说:“人这一生,相识是缘,相处是分。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,都应坦诚相待。”

然而,命运弄人,天不遂人愿,王欢仁好友走得过早。1997年,年仅54岁的他,因病医治无效,永远地停止了呼吸。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,我正在朔州和大同市参加省里组织的教育督导检查,未能送他最后一程,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遗憾。后来听说葬礼那天,送行的队伍排成长龙,其中有他帮助过的农民,有他教导过的职工,有他关心过的街坊邻居……人们红着眼眶,纷纷诉说着这个平凡人不平凡的一生,感慨着世上难得有这样的好人。

王欢仁的过往,让我恍然领悟到:生命的价值,从来不只在于它的长度,更在于它的厚度。王欢仁同志的人生虽不漫长,却厚重如同一部蕴含深刻智慧的书籍。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尽职守,默默奉献;在家庭中言传身教,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;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,播撒真情与善意。这些看似平常的点点滴滴,却如同一颗颗璀璨的珍珠,汇聚成了他生命的重量。

生命的厚度,从来都隐匿在平凡的坚守和温暖之中。好友王欢仁的人生价值,让我真切懂得了,什么才真正是“了不起”的人生!